

中文教育在印尼多元文化中的传承与传播研究

陈友明

摘要

华人移居印度尼西亚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华人历来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子女的语言文化传承。本文从印尼华人社会结构、代际语言特征以及社会环境三个视角，探讨主流语言、地方方言和英语对华语传承的影响。

近代以来，伴随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入推进，印尼的中华文化遗产与华文教育体系经历了压制与复兴交替的复杂历程。进入新世纪后，印尼政府逐步调整语言政策，积极推动多语教育体系的发展，并实施对华友好政策，从而为中华文化及华文教育的复兴提供了制度性支持与社会空间。在此背景下，三语教育模式——即同时教授印尼语、汉语与英语——应运而生，标志着华文教育从传统族裔内部传承转向现代化、多元化的教育范式。该模式不仅拓展了华语教育的受众范围，使其成为跨民族共享的文化与教育资源，更体现出“有教无类”的包容性教育理念。通过积极融入印尼国民教育体系并与本土文化开展深度对话，三语学校在促进文化传播、推动价值共创与构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结构性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印尼合作持续发展，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和企业快速增长。汉语人才需求的激增，激发了华裔及其他族裔学习

汉语、了解中国、体验中华文化的热情。多元化的汉语教学方式、职场汉语、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成为当今印尼中文教育的新特点。三语学校在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和机遇，可以为促进多元文化融合、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印尼华人 多元文化 中文教育 三语教育 语言

引言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国家，全国分布着三百多个民族、七百余种地方语言。这种多样性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在长期的历史交流与社会整合中形成的“多元一体”（*Bhinneka Tunggal Ika*）格局，成为印尼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

印尼的多元文化源自多重历史因素：原生的南岛文化、佛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文明的传入、殖民时期的西方影响，以及来自华人移民的文化元素。国家理念“建国五项原则”（*Pancasila*）与“协商-共识”精神（*musyawarah mufakat*），体现了社会对差异的尊重与包容，使多元成为印尼社会的共识与价值。

在这一多元文化语境下，华人群体作为印尼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语言与文化传承经历了曲折与变迁。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华文教育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的政治动荡使华文教育一度中断；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民主化进程与文化多元政策的推进，华文教育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与社会认同，也面临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实现可持续传承的新课题。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印尼关系的不断深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华文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多元文化背景下，中文教育的传承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也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作为印尼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文教育不仅是一种语言教学实践，更是中印尼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它在促进华裔社群文化传承的同时，也为印尼社会的多元共生与文化融合注入了新的活力。研究中文教育在印尼多元文化中的发展脉络与实践模式，有助于深入理解语言教育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中文教育在跨文化共融中的价值与方向。

本文立足印尼华人社会特点和语言传承演变的现实，结合本土民众情感和国家政策背景，通过华语传承及三语教育的实践，探讨中文教育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生根发芽、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策略与举措，旨在为推动印尼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促进跨族群文化理解与

融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研究印尼多元文化格局下中文教育的传承与传播，不仅有助于理解语言在跨文化语境中延续，还可为其他多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经验与启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于2025年5月至8月期间，对印度尼西亚40所三语学校的中学部（7至12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5,229份，内容涵盖学生的语言背景、中文学习经历、语言能力自评、学习动机、媒体使用习惯以及对三语教育的态度等多个方面。问卷题型包括单选、多选及开放式问题，采用中印双语设计，确保学生理解无误。调查通过各三语学校协助分发与回收，以增强数据的真实性与广度。该问卷为本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实证基础，支持对印尼三语学校中文教育现状的定量与定性分析。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深入分析与研究，本文获得了丰富而具有实证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一、印尼华人社群的结构、语言传承与代际特征

（一）印尼华人主要流布区域与社群结构

自十八世纪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大量移民陆续南迁至印度尼西亚。“中国人在走出国门的同时，也把中国话带到了世界各地”（郭熙，2024）。他们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地域分布与社群结构来看，印尼华人主要集中于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邦加及廖内等地区，其内部构成以闽南、客家、潮汕、粤语及福清等籍贯群体为主。闽南籍华人定居历史最为悠久，多分布于苏门答腊北部、棉兰、廖内及爪哇沿海地带；客家籍华人为人数最多的群体，约占印尼华人总数的四成，广泛散居于爪哇、苏门答腊及邦加等岛屿，其中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地区客家话甚至成为当地的主要方言；潮汕籍华人多集中于坤甸、占卑及爪哇岛部分城市；粤籍华人主要分布于雅加达、泗水、东加里曼丹及南苏拉威西的锡江；福清籍华人则集中在泗水、三宝壟和万隆等地。除上述主要群体外，亦有少量来自海南、湖北、广西、山东、温州等地的华人，但其规模

相对较小，未形成稳定的社群结构。总体而言，印尼华人社群的地域分布广泛、方言差异显著、文化认同多元，不同籍贯群体在长期的迁徙、通婚与社会互动中逐渐实现了文化融合与身份重构，形成了具有印尼特色的华人社会生态。

（二）印尼华人社群的语言传承、变迁与代际特征

印尼华裔的语言传承特征因代际变化而有所不同：

印尼华人社群的语言传承呈现多样化特征，其维系程度受家庭、教育、社会及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并在代际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与变迁。

在语言传承方面，家庭环境起着基础性作用。孩子是否坚持使用中文或方言，父母对中文教育的态度起着直接的影响。学校教育则从早期的私塾延续至现代华文学校，成为语言延续的重要支撑。而华人社群内部的社交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语言的保持。从地域来看，客家人家庭语言传承相对较好；闽南语在苏门答腊北部仍较为稳定；爪哇岛及印尼东部群岛的华语传承则相对较弱。

就语言使用的代际变迁而言，印尼华人面临融入主流社会与维系文化传承的双重趋势。约翰·W·贝里将其归纳为文化融合模式。¹ 老一辈华人多坚持使用族群方言，而年轻一代因受家庭保姆、同伴群体、学校教育等多语环境的影响，常同时使用母语、地方方言、印尼语乃至英语，形成语言混合与交叉使用的现象。

此外，印尼政治变迁对华语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自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起，政府长达三十余年的文化抑制政策导致华语教育几近中断，造成新一代华裔掌握华语者日益减少。这一历程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对语言传承的关键作用，也凸显出印尼多元语言生态中华语维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1 Berry, J. W. Phinney, J. S. Sam, D. L. & Vedder, P. (Eds.). *Immigrant Youth in Cultural Transition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Across National Contexts*,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4.

(三) 印尼华人的代际语言实践与身份认同

印尼华裔的语言传承特征因代际变化而有所不同：

第一代华人移民（二十世纪40年代之前）：这些早期来自中国的华人移民主要使用家乡话进行交流。然而，在印尼生活多年后，他们逐渐学习并使用印尼语或当地方言与当地华人交流。

这一时期，华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没有统一的通用华语，华人根据族群使用各自家乡方言。在华人聚居的地区，华语方言甚至发展成为地方方言，影响着原住民的语言特征。例如，在山口洋、邦加和棉兰等地，原住民也会使用当地的华语方言。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早期，使用不同方言的华人除了书面交流外，还常常面临语言障碍，不得不依赖地方语言和混合语言进行交流。

第二代华人（40年代之后）：出生于印尼的第二代华人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这一代华人在公共场合主要使用印尼语和地方语言。然而，在家庭和华人社区，他们通常使用自己的方言或普通话。这个时期，正规的华校逐渐普及。华校公会制定了统一的教学语言，要求教师使用“清音”（即普通话）。尽管口音存在差异，但教学语言基本保持一致。文体也采用现代白话文。由于华校使用“国语”（又称“普通话”）作为统一语言，普通话成为华人社会的主导语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

这一时期的华文教师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或培训，他们在一定阶段毕业后便开始教授低年级课程。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代接受过华校教育的华裔学生和教师，后来成为传承中华文化和语言的代际桥梁和印尼华文教育复兴的中坚力量。

第三代华人（196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新秩序政府对华语和中华文化的严厉禁令，华校被关闭，这一时期出生的华人基本上就读于印尼学校，校园中传承华语的现象已然消失。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压力的综合作用下，第三代华人普遍加入印尼国籍，政治认同上逐渐向印尼国家靠拢。与此同时，宗教信仰也出现明显转变，受宗教背景学校教育的影响，许多新生代华裔皈依基督教等西方宗教。身份属性、

政治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变化，再加上苏哈托政府推行的强制同化政策和改名制度，以及部分华人与原住民通婚的现象，使第三代及其后代的华裔民族意识逐渐淡化，中华文化的外显符号和认同感也随之减弱。

表 1：印尼华人宗教信仰情况

统计年份	伊斯兰教	基督教 / 天主教	印度教	佛教	孔教	其他
1971	-	19.06%	-	42.85%	38.09%	-
2000	5.41%	35.09%	1.77%	53.82%	-	3.91%
2010	4.65%	42.80%	0.13%	49.06%	3.32%	0.04%

数据取自：《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一册）

表 1 中显示的数据是印尼华人宗教信仰的比例变化。1971 年，华人信奉传统宗教儒教的信徒比例为 38.09%，但到 2010 年仅为 3.32%；佛教信徒比例增长了约 7-10%；其中，西方基督教的信徒增幅最大，从 19.06% 增至 42.80%；少数华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4.65%）。宗教信仰反映了文化属性，这表明华人宗教信仰的变化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

第四代以后的华人：进入本世纪后，除了少数地区，比如山口洋、棉兰、坤甸、邦加、占卑等极少数地区华人家庭仍保留家乡话传承，印尼大部分地区的华人家庭基本没有传承华语的现象。新生代华裔日常交流多使用印尼语和印尼方言（参考表 2，表 3）。进入本世纪，印尼实行民主改革，华语和中华文化获得解禁。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中印尼合作的深入，汉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年轻一代对华语的兴趣逐渐恢复。许多华裔子女选择就读设有汉语课程的学校，例如三语学校。但他们的汉语水平普遍较低，日常交流仍然以印尼语、印尼方言。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只有 24.07% 的印尼华人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普通话或汉语方言，而多数华人（约 60.49%）则把印尼语当作日常语言。另外，约有 12% 的华人在日常使用印尼方言。换句

话说，有 72% 左右的华人视印尼语和印尼方言为母语。²

表 2：印尼三语学校华裔学生家庭语言环境

有华语言环境 %	没有华语言环境 %
54.87	45.13

表 3：印尼三语学校华裔学生家庭语言使用情况

华裔学生家庭语言使用情况	%
印尼语	55.72
印尼方言	17.81
汉语普通话	7.65
汉语方言	11.53
英语	7.30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尼华裔家庭的语言环境及母语的使用逐渐式微。从本人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中获知：约 54.87% 的华裔家庭仍存在华语言环境，但有 45.13% 的家庭完全以印尼语或地方语为交流语言（见表 2）。进一步统计可见，印尼语在家庭语言使用中占 55.72%，而汉语普通话和各华语方言合计仅占 19.18%（表 3）。这不禁让人疑惑：如若 54.87% 的家庭拥有汉语环境，为什么使用普通话的家庭不到 20%？原来，尽管存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但新一代华人家庭在家里交流时并不一定使用汉语。从中亦说明了，汉语在印尼家庭层面的代际传承已显弱势，印尼语的社会整合功能逐步取代了母语地位。根据 Fishman 的语言维系理论，家庭语域是族群语言延续的核心领域。就是说家庭语言输入量是中文传承的关键变量。（Fishman, 1964）当母语使用率低于 50% 时，语言维系进入“转移危机期”。印尼华裔群体的情况恰处于这一临界点，这意味着中文学习更多依赖学校教育的制度性推动，而非自然的家庭输入。中文教育的“在地化”

2 廖建裕 (LEO SURYADINATA). 未竟之路, 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一册), 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因此呈现出“由家庭传承转向学校建构的结构特征。”(Fishman, 1991) 强调“代际传递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在语言维系中的关键地位：若家庭—社群—学校层面的传承断裂，就意味着语言转移 (language shift) 进入实质阶段。

研究发现，在一些具有深厚华语方言传统的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一种主导方言。这些地区的华裔群体即便来自不同的方言背景，也倾向于使用当地通行的共同方言作为交流媒介。例如，棉兰以闽南语为主，山口洋、邦加和亚齐盛行客家语，占卑和坤甸则通用潮州话。相较之下，在爪哇、南苏门答腊、东加里曼丹、苏拉威西、马鲁古等印尼东部曾经通行汉语普通话的区域，新生代华人已普遍不再使用普通话。自二十世纪 60 至 70 年代政府全面禁止华语教育以来，普通话的使用几乎从这些地区消失。这一现象反映出华语方言在民间的生命力与韧性，同时也揭示了家庭语言传承在维系族群语言文化中的关键作用。

小结

总体而言，华裔移民在印尼的历史发展过程，既是一段跨文化迁徙的历程，也是一场持续的文化整合实践。移民群体在融入主流社会与传承本族文化之间不断寻求平衡，形成了兼具在地化与族群性特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整合不仅回应了海外华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深刻影响了其身份认同、宗教信仰及族群结构的演变。正如 Berry (1997) 在“文化适应理论 (Acculturation Theory)”中所指出的，移民在异文化环境中往往在“同化”“分离”“边缘化”与“整合”之间作出选择，其中“整合”模式最能体现华人移民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参与所在社会的过程。由此可见，印尼华人的文化演进既有自然互动的结果，也受到国家政治体制与社会政策的深刻影响，显示出华人社群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动态适应与持续发展。

在这一文化整合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教育的命运与变迁成为印尼华人社会适应与重构身份的重要标志。随着政治环境与社会结构的转

变，传统华文教育逐渐经历了由单一族群教育向多语言、开放型教育体系的转型。进入本世纪，三语学校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印尼多元文化政策的导向，也体现了华人社群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积极融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努力。

二、华文教育体制的变革： 三语教育体系下的中文教学实践

（一）华文学校的历史沿革：从侨民教育到三语教育体系

印尼是中国海外开办华文教育最早的地方。1787年在巴达维亚的明诚书院，被公认是海外最早的旧式华校。³ 二十世纪50年代是印尼华文教育的鼎盛时期，据统计，1957年印尼有华校1,875所，学生人数达42.55万人。⁴ 1966年，印尼政府关闭所有华校，华文教育瞬间消失。本世纪后，出现了三语教育，即印尼语、英语、汉语三语并行的全日制国民学校。三语学校符合政府对私立学校的教育政策，被归类为National Plus School，即增设或强化某一课程（中文）的学校。印尼的三语学校不再仅仅是针对华人的族裔教育，它的出现带来了印尼华文教育的体制变迁。

表4：印尼三语学校中学生族裔构成情况

华裔 %	非华裔 %
80.97	19.03

表4是印尼三语学校中学生族裔构成的情况。在样本中，华裔学生占80.97%，非华裔19.03%，表明中文教育的受众已突破族群界限，逐步成为开放型语言教育模式。三语学校是纳入印尼国民教育体系的新兴教育模式，说明印尼的华文教育已经形成体制性的变迁，同时展现了三语学校中文教育对非华裔的吸引力，从侧面折射了华族与

3 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362,363页。

4 八华学校115周年诞辰纪念特刊，第17页。

土著共生共融的社会文化生态。

(二) 三语教育的现实挑战与对策探析

在多元文化、多语言并存的环境中，三语教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遭遇多方面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涉及社会和语言环境的压力，也反映在课程安排、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外部媒体的影响等层面。在印尼教育体系中，印尼语作为官方语言，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而被广泛重视，相比之下，汉语的地位相对次要，导致学生学习动机不足。早些时候，三语学校一度备受各方偏颇和质疑，这些因素都使得三语教育的推进面临阻力。

具体问题与对策：

1. 三语并行学习的有效性问题的

这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学生在同时学习三种语言时可能出现混淆与学习效率低下的情况。事实上，对于生活在多语言环境中的孩子来说，从小接触和学习多种语言是自然现象。多语言环境中的儿童从牙牙学语的那一刻起，就接触了母语、地方方言、印尼语等多种语言，他们的母语和第一语言习得是同步发展的，这说明在儿童时期同时学习多种语言是可能的。从心理上讲，幼儿在语言习得和语用能力方面拥有超越成年人的潜力，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语言本能”。

儿童多语言习得的自然性与同步性可由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本能”与“普遍语法”理论（1965）、伦纳伯格（Eric Lenneberg）的“关键期假说”（1967）以及克拉申（Stephen Krashen）的“输入假说”（1982）等共同支撑。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儿童在语言习得期内具备先天的语言机制与高度的可塑性，多语言接触不仅不会造成混乱，反而能促进认知与语用能力的双重发展（Piaget, 1959; Vygotsky, 1978; Genesee, 1989）。

林若望（2016）认为语言的学习难度是相对的，取决于它在语言谱系上与你的“母语”的距离远近。汉语、印尼语和英语是不同的语

言体系，因此母语人士学习汉语自然会感到困难。然而，对于华裔，尤其是居住在山口洋、坤甸和棉兰等华语方言浓厚地区的华裔，他们从小就使用方言，学习普通话自然比其他族裔容易得多。

对策：通过课程分层、教学策略优化以及母语迁移规律的利用来提高学习成效。须利用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从幼儿时期就开始抓起。语言是自然习得的，在课堂和学校环境中营造丰富的语言环境至关重要。在大多数三语学校，汉语在幼儿园课堂教学中占比超过50%，并且大多由普通话良好的教师授课。这使得孩子们在幼儿园三年内就能理解普通话。小学低年级也注重语言意识的训练，使学生毕业时普遍能讲普通话，为以后的学习和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表 5：三语学校中学生学习中文的时长

学生中文学习的起始年级	%	学习中文的累计时间	%
幼儿园	51.88	1-3 年	15.82
小学	28.69	4-6 年	15.24
初中	12.62	7-9 年	30.46
高中	6.81	10-11 年	38.48

表 6：三语学校学生对三语并行学习的认知和评价

学生对三语并行学习的感知	%
会感到困难	21.69
一般	58.23
不会感到困难	20.08

表 5 显示三语学校的中学生学习中文大多是从幼儿阶段就开始（51.88%），小学阶段 28.69%；7-9 年的有 30.46%，10-11 年的有 38.48%。从中可以想象出三语学校中学生的中文水平比普通学校更高。

学生对三语学习的认知：有 58.23% 的学生认为三语并行学习难度“一般”，20.08% 学生不会感到困难，仅 21.69% 感到困难。这说

明多数学生对三语并行持正面态度，也反映出多语言环境对学习者的具有认知正迁移效应（Cummins, 1979）。三语教育在印尼社会的接受度和适应度正逐步提升。

综上，印尼三语学校的中文教育已形成一定体系，但教学深度仍受教师语码选择、教材难度及输入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语言能力的培养呈“广度大、深度浅”的结构。三语学校中文教学质量控制有待提高。

2. 课程结构与课时安排的平衡

挑战：三语并行导致课时增加，学生学业与心理压力加重。

根据教育部课程规定，学校每周需开设约 28 节课。增设中文课程将使总课时数增至 35-40 节，这将给学生带来压力。

对策：合理设计课程结构，倡导“减负增效”，引入跨学科融合课程。可通过适当调整课程和课时来解决。例如，缩短课时；将当地方言课程和选修科目改为中文授课；利用下午的课程辅导时间教授中文；将道德、体育、音乐、书法、绘画、手工等文化科目改用中文授课；教育部 2020 年自主课程（independent curriculum）允许学校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自主设计课程，为三语学校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表 7：课堂语言使用情况

中文课老师的授课语言	%
汉语	49.05
印尼语	9.41
双语	41.54

表 7 显示三语学校课堂语言使用与教学策略。调查显示，中文教师全汉语授课者占 49.05%，双语授课占 41.54%。教师频繁的语码转换虽有助于理解，却削弱了学生的语言沉浸度和交际能力形成。可见，印尼三语学校在平衡“理解度”与“语言纯度”之间仍需探索。

表 8：三语教育学生中文学习成效情况

用汉语交流的能力	%	阅读中文书刊的能力	%	书写中文书信的能力	%
能够	17.21	能够	8.76	能够	23.06
一点点	62.61	一点点	52.74	一点点	45.29
不能够	20.18	不能够	38.50	不能够	31.65

表 8 显示，三语学校中学生在会话方面，将近 80% 基本可以用汉语简单交流；在阅读方面相对较差，有 38.50% 有待提高；在书写方面能力差的有 31.65%。说明三语学校的中学生在读、写方面存在不足，但是大部分学生基本上可以用汉语交流。

以上几个数据显示三语学校学生的学习起点与持续性：超半数学生（51.88%）自幼儿园起接触中文，但能流利交流者仅 17.21%，能阅读中文书刊者仅 8.76%，显示学习年限与语言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这种“学久而不精”的现象，印证了 Krashen 的输入假设：学习者虽长期接触目标语，但缺乏足够的“可理解输入”和真实使用情境。

3. 中文师资匮乏的现状与应对

“三教”是学校管理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而教师是其中的核心。由于华文教育中断 30 多年，华文教师短缺、教学水平不足成为三语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

对策：加强本土师资培训，拓展国际教育合作，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多年来，我们依靠以下因素来缓解这些挑战：

- 20 多年来，祖籍国对印尼华文教育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师资培训方面，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多元化培训方式，对提升印尼华文教师的素质和教学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中国侨办和国家汉办（今语合中心）每年都持续派遣中文教师到教学第一线。

- 中国政府华文教育奖学金项目。2003 年，国侨办为印尼华文教育设立了本科奖学金项目，最初每年 40 个名额，如今每年 200 个名额，可分别就读于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20 年来，该项目已培养近

3,000 名中文师资；此外，为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三语学校协会与天津大学合作开办国际中文教育硕士奖学金项目。该项目由语合中心资助，自 2024 年起每年颁发 40 个奖学金名额。

- 中文师资也有来自印尼高校的汉语专业毕业生。

4. 外语媒体与社会语言环境的影响

印尼语与英语在大众传媒与网络中的强势地位，使汉语学习缺乏自然语境支持。

表 9：学生观看中文媒体的情况

学生日常接触的媒体语言	%	学生对中文视频与影视的兴趣	%
印尼语 /Bahasa Indonesia	31.27	喜欢 /Suka	34.63
英语 /Bahasa Inggris	61.56	一般 /Biasa saja	49.24
汉语 /Bahasa Mandarin	7.17	不喜欢 /Tidak suka	16.12

表 9 显示了学生普遍观看和喜爱的媒体类型。大多数学生 (61.56%) 更喜欢观看英语节目，其次是印尼语 (31.27%)，中文媒体最少 (7.17%)。然而，中文视频和影视也受欢迎。

表 10 显示，英语和其他西方产品仍然主导着学生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除了 TikTok，印尼学生对其他中文网络平台的使用率仍然很低。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媒体在国际公众视野中持续走弱。

媒体与文化输入的有限性：在日常媒体接触中，英语视频占 61.56%，印尼语占 31.27%，汉语仅 7.17%。这反映出中文在印尼青年文化消费中的边缘化。文化输入不足削弱了语言学习的情境支持，也说明中文传播尚未与大众文化有效结合。

表 10：学生喜欢使用的网络平台

喜欢使用哪个网络平台	%
微信 /WeChat	2.87
微博 /Weibo	1.47

(接上表)

WhatsApp	26.17
Facebook	1.65
Instagram	21.52
Twitter	3.32
Youtube	21.57
TikTok	21.43
小红书	4.74

对策：应积极构建校园中文语言环境，开发多样化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增强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的中文使用情境。同时，建议中国媒体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推出更多兼具娱乐性与文化内涵、符合海外青年审美与兴趣的节目内容。就政治与国际传播层面而言，媒体不仅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更是国家竞争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平台。

5. 学校数量与生源规模的不均衡问题

挑战：公立学校提供免费教育，而私立学校却普遍存在。宗教背景的学校宣扬自身的宗教教义，对宗教信仰强烈、中国价值观淡薄的华人家庭更具吸引力。

对策：面向全社会开放，扩大生源渠道，学费标准平民化。这不仅有助于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也有利于中文融入本土。

(三) 当今印尼中文教育语言传承的新特点

在中文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在语言习得能力方面，族裔背景不是第一要素，各族裔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相近。实践证实了不少非华裔学生的汉语语用能力不比华裔学生差，有的甚至相当优秀。

不少非华裔学生到中国攻读中文教育专业，学成之后回本国担任中文教师，给三语学校的华裔子女传授华语和中国文化。这种语言文化的逆向传播现象即是好事亦是憾事。积极的一面说明了华语和中文教育已不是华人族群的私有财产，而是中文教育国际化、在地化的可喜进展。彰显了中文的强劲魅力和吸引力，促进了当地多元民族的团

结和谐和文化交融。遗憾的是汉语教师是非华裔。从学科角度来看，汉语或已成为华裔的外语？

表 11：三语学校学生学习中文的原因及目的

请说说你学习中文的原因	%
父母推动	38.86
自愿	28.71
朋友影响	2.66
其他	29.78

请你说说学校汉语的目的	%
容易找工作	19.73
得到更好的待遇	15.06
了解中国文化	13.22
到中国留学	14.13
能够和中国人交流	23.81
和中国人做生意	14.05

对于学生学习中文的动因和目标，表 11 中显示，父母推动和学生自主选择是主要的；学习目的更多的学生认为是为了方便和中国人交流、做生意；也有为了到中国留学；还有为了将来更容易找到工作，得到更好的待遇。

关于学生选择三语学校就读的原因，表 12 中显示，有 92.18% 的学生喜欢在三语学校就学。原因是能够学到中文，学校设施好、校风好、同学之间关系融洽，从中体现了中华美德的吸引力；但是课时多是学生们普遍感受到压力，“学费高”也是家长们常予诟病的话题。

表 12：学生选择三语学校就读的因素分析

学生喜欢或不喜欢三语学校的情况	喜欢 %	不喜欢 %
	92.18	7.82

喜欢的原因	%	不喜欢的原因	%
能够学到中文	25.11	课时太多	35.86
学校设施好	20.77	学费高	15.37
学校校风好	20.19	其他	48.77
同学之间关系很融洽	21.72		
其他	12.21		

小结

问卷显示, 学生学习中文的主因以父母推动 (38.86%) 为主, 自愿学习者占 28.71%。这表明印尼学生的学习动机以“外在驱动”为主。但在学习目的上, “能够与中国人交流” (23.81%) 与“到中国留学” (14.13%) 名列前茅, 说明学生逐渐将中文视为现实交流与升学的工具, 体现出典型的工具性动机特征 (Gardner, 1985)。在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中, Gardner (1985) 指出, 学习动机由学习者的努力程度、学习愿望以及对语言学习的态度共同构成, 是影响语言学习成效的关键因素。在印尼三语学校中, 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既可能体现为工具型 (为升学或职业前景), 也可能体现为融入型 (出于文化认同与兴趣, 多为华裔学生), 这两种动机共同塑造了学习者的语言行为与成效。

三、印尼中文教育的在地化传播现状与特征

印尼的华文教育最初只是华人的母语传承。但随着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华文教育逐渐扩展到本土族群。华文教育的在地化传播, 标志着印尼华文教育的制度化转变。

(一) 当前印尼中文教育的总体概况

国际汉语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普及、在地化和低龄化。鉴于印尼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汉语教育发展相对滞后。

由于印尼教育部等政府机构没有统计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数量,

因此这些数字只能估算。首先，由于印尼汉语人才和师资短缺，现有的教学资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因此，数据收集可以重点关注爪哇岛和其他主要岛屿大中城市的特定学校，例如三语学校、国际学校、有华人背景的私立学校、公会学校、佛教学校、基督教学校以及知名公立学校。乡村学校和伊斯兰学校暂时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印尼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https://www.bps.go.id/id>)，2023 学年，印尼共有全日制中小学 256,501 所，学生人数 44,420,000 人。其中，高中（公立和私立）14,573 所，学生人数 5,370,000 人；职业高中 14,461 所，学生人数 5,050,000 人。根据印尼教育部现行课程设置，汉语为高中选修科目。如果印尼 5% 的高中（职业高中不计）开设汉语科目，则将有 730 所学校。假设这些学校中有一半学生选修普通话科目，则将有约 135,000 名学生。印尼共有初中和小学 227,467 所，学生总数达 3,400 万。由于汉语尚未被纳入外语课程，除大中城市少数华人背景的私立学校外，在偏远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数量非常少。据估计，印尼仅有约 0.5% 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约 1,100 所学校 17 万名学生。开设汉语专业的高校有 34 所，学生估计有 15,000 名。

根据教育部国际学校服务网数据 (<https://layananspk.pauddikdasmen.kemdikbud.go.id/>)，2022 年共有 655 所国际学校 (SPK)。如果 25% 的国际学校开设汉语课程，那么开设汉语课程的概率为： $655 \times 25\% = 164$ 个。假设每所学校平均有 500 名学生，那么在国际学校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约为： $164 \times 500 = 82,000$ ；

根据笔者统计，印尼三语学校约 120 间，学生约 130,000 人；

印尼教育部网站上没有汉语补习班、培训班和家庭教师的相关数据，因此无法准确估算其数量。

综上所述，印尼现有约 150 万汉语在学者，仅占该国 2.8 亿人口的 0.5% 左右，普及率还是很低的。

(二) 汉语在印尼外语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表 13: 汉语在印尼外语中的地位

从实用角度评估汉语在印尼多个外国语种中的地位		
名次	国别语言	原因
1	英语	世界语言
2	阿拉伯语	伊斯兰宗教语言
3	日语	较早投资来源国、日本企业和技术人员多、留学和工作目的国
4	韩语	电视剧文化宣传、美容化妆、工业产品、投资来源国
5	汉语	未来的交流语言, 印尼华人华侨众多, 东盟 + 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实施

据笔者了解, 汉语在印尼社会生活和大学课程中的使用仍相对有限。如表 13 显示, 汉语排名第五, 落后于英语、阿拉伯语以及日语、韩语。

(三) 中文教育在地化过程中的困境与挑战

中文要发展, 必须国际化、现代化、本土化。国际化是一个宏观概念, 而本土化则是一个具体概念。国际化体现在本土化实践中。中文本土化需要现代软件的支持, 而汉语教师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由于 30 多年华文教育的断层, 导致汉语师资短缺, 给中文教育发展带来了挑战。为了推广中文, 需要大约 10 万名汉语教师。目前, 印尼只有大约 5,000 名左右汉语教师, 无异于杯水车薪。

汉语师资紧缺的原因还来自市场竞争。自“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尼推进以来, 中印尼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大量中资企业进驻印尼, 对具备汉语能力的人才需求激增。相较于教育行业, 这些企业提供的高薪待遇对年轻的汉语人才具有强大吸引力, 导致有限的汉语人力资源更多流向企业领域。由此, 汉语人才市场竞争加剧, 进一步加深了教育系统中汉语师资短缺的困境。

表 14：三语学校学生对成为汉语教师的意愿

愿不愿意当中文老师?	愿意 %	不愿意 %
	14.13	85.87

三语学校学生普遍对教师职业持负面看法。这是因为印尼教师的收入与其他职业相比普遍较低。表 14 显示，只有 14.13% 的三语学校学生有兴趣成为中文教师，其余 85.87% 的学生表示不愿意。

印尼中文教育在地化发展任重道远，这是一个具挑战性的课题。

小结

尽管中文学习存在困难，但 92.18% 的学生仍表示喜欢三语学校，其中“能学到中文”（25.11%）为最主要原因。中文教育已成为学校品牌形象与教育竞争力的重要象征。

然而，仅 14.13% 的学生表示愿意成为中文教师。表 13 所示的印尼各地工资标准数据显示，普通民办学校教师的薪资大致处于各省省会城市的基本水平，而中文教师的工资略高于这一水平。然而，尽管薪资略有优势，其社会认同度和职业吸引力仍然有限。这反映出印尼中文教育的人才培养与补充机制尚未形成良性循环。

总体来看，中文教育的传播在印尼已由“家庭传承型”转向“社会制度型”，其持续发展取决于教育资源、师资保障与文化认同的共同支撑。

四、“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印尼中文教育新发展

（一）“一带一路”倡议赋能印尼中文教育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印尼双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汉语人才成为企业和教育机构争相追逐的紧俏人才。

如表 15 中所显示，汉语人才的薪资远高于普通劳动者，说明掌

握汉语已从一种技能优势转化为职业和经济优势。汉语的价值无疑成为学生学习中文的巨大动力，对中文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表 15：印尼各主要省市区域 2024 年最低工资标准

县级城市大概工资标准（盾）	省会城市	泗水、雅加达	普通民办学校教师工资	中文教师工资	中资企业中文职工工资
250 万	300-400 万	500-600 万	所在区域标准工资	双倍以上标准工资	1,000 万以上

信息来源：印尼中央统计局 (<https://www.bps.go.id/id>)

（二）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导向：“中文+专业”与“职业+中文”模式

从宏观层面看，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分为事业导向和学科导向。事业一定是重要导向（郭熙 202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尼国家发展的重大影响，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在当今以应用为导向的时代，职业教育已成为全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它对于促进就业创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祉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领域，“中文+专业”教育有助于促进学习者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中国产业、产品、技术标准和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增进中印尼经贸合作。经济发展是推动汉语成为世界性外语和印尼国民基础教育外语的主要动力。

“职业+中文”型人才需求的快速增长，集中体现在印尼各地新兴工业园区和基础产业对汉语专业人才的强烈需求上。例如，北苏拉威西省的莫洛拉维工矿区、加里曼丹的镍铁生产基地、苏门答腊的棕榈油与橡胶产业基地，以及爪哇岛的万登、卡拉旺、巴塘、肯达尔等大型工业园区，均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投资。此外，雅万高铁建设及公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电商、旅游、餐饮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对汉语应用型人才的持续需求。

（三）印尼高等教育体系中中文课程的拓展与融合

近年来，印尼高等教育中中文教学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既有以汉语为主干的本科与专科专业，也有“专业+汉语”的课程嵌入与短期职业汉语培训。还有多所高校与中国院校建立预科或合作办学项目，共同培养复合型人才。这种多层次的课程体系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诉求：既为拟从事语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学生提供系统训练，也为就业导向强的学生提供与行业紧密对接的语言能力。

中文价值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文化与交流功能上，更转化为明显的职业与经济回报：掌握汉语者在跨国企业、旅游、外贸与教育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从而成为吸引学生报读中文相关课程的重要动力。面对以应用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中文课程亟须从“语言传授”向“能力供给”转型，强调语言能力与专业能力的耦合（例如商务汉语、旅游汉语、语言翻译与产业实习模块）。

为实现这种转型，院校应着力三方面：一是强化“语言+职业技能”的联合培养路径；二是校企与国际合作——借助与国内外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拓展实习、就业与教师交流渠道，提升课程的行业相关性；三是质量保障与师资建设——建立与行业需求对接的评价指标，支持教师接受实践导向培训并参与课程共建。

总体而言，印尼高等院校在扩展中文课程时，应以就业与社会需求为导向，兼顾语言深度与职业适配，通过校际、校企与国际合作，把中文教学打造为通向个人职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参与的桥梁。

目前，印尼共有34所公立和私立大学正式开设汉语专业，另有多所高校正在筹划设立相关课程，显示出中文教育在印尼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持续拓展趋势。与此同时，多项与中国高校合作的预科及职业教育项目相继启动，进一步完善并丰富了印尼中文教育的层级结构。

印尼设有中文专业的院校大都与中国的高等院校进行学历、课程学术合作，如雅加达东坡学院与天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侨大学联合开设“3+1”本科项目，为学生提供学历与跨国学习的机会；丹格朗八华学院与河北师范大学、巴厘岛文侨三语学校与云南师范大学

合作开办预科课程，为升读中国高校打下语言与学术基础；雅加达智民学院、新亚学院等职业院校则以两年制汉语课程培养应用型语言人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印尼大学在原有专业体系中增设中文课程，形成“专业+汉语”的复合培养模式。

（四）人工智能赋能中文教育的创新路径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印尼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人工智能语言学习平台使中文学习过程更加高效灵活，也极大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且学习者能够获得即时反馈与个性化学习路径。通过便捷的语种转换机制，印尼学习者能够以其母语为基础自动生成中文内容，从而有效提升语言学习方法与书面表达能力。同时，依托人工智能在线课堂，学生可突破地理限制，实现远程中文学习。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应用正在成为印尼中文教育的新亮点和新动力。

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多数印尼三语学校的中文教师因在他们的学习阶段尚未接触过 AI 技术，对智能教学平台的认知与操作能力普遍有限，导致 AI 在教学中的应用进展缓慢。一些教师仍沿用传统教学模式，甚至出现“教师技术落后于学生”的现象，这不仅影响课堂互动，也阻碍了教学创新。

为此，亟需通过系统的培训与理念更新，使教师掌握人工智能在教学设计、评价与资源开发中的基本运用方法；同时，应推动学校建立 AI 教学支持体系，鼓励教师在课堂中探索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唯有当技术融入教学理念与教育文化，人工智能方能真正成为印尼中文教育的新引擎，助力其向智能化、开放化与可持续方向发展。

小结

总体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背景下，印尼中文教育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该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推动了中印尼两国在教育、文化与人才培养领域的深度合作。随着“中文+专业”“职业+中文”模

式的兴起，中文教育的功能已由单一的语言传授，拓展为服务经贸、科技与人文交流的综合教育体系。这种跨学科、跨文化的融合模式，使中文教育成为促进两国互联互通与人文互鉴的重要桥梁。

同时，印尼高等教育体系中中文课程的拓展，反映出中文正从“外语教育”逐步向“学科建设”与“职业应用”并重的方向转型。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引入，更为教学模式创新与资源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撑，推动了中文教育的智能化、个性化与全球化发展。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印尼中文教育，正由文化传播型教育向服务国家发展与区域合作的战略型教育转型，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在地化与创新性新阶段。

五、结论

在印尼多元文化与多语并存的格局中，华文教育的传承与传播经历了由族群内部祖语承继到跨代语言转型、由传统华校到三语教育模式的多重阶段。这一演变不仅反映了华裔社群在身份认同与文化维系上的历史选择，也折射出中文教育在地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 5,229 份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印尼国民教育体制下中文教学状况综合分析，可归纳印尼中文教育在地化传播的三项主要特征：

1. 语言传承的外移化：家庭语境中的中文功能弱化，学校成为主要维系场域；

2. 教育体系的多语融合化：三语教育形成兼容并蓄的教学格局，但深度学习仍受输入与资源制约，质量控制亟需提高；

3. 传播动因的工具化与社会化：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更多出于升学、职业及国际交往需要，体现了印尼多元文化社会中语言教育的实用取向。

这一现象表明，中文教育在印尼已不再局限于族裔文化传承，而是在国家多语政策与全球化趋势中，逐步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分析表明，印尼三语教育体系不仅是语言教学的实践场域，更是语言政策、文化认同与社会结构互动的缩影。中文教育的在地化传播

应超越单一的语言传授，重视与本土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使中文学习成为理解多元文化、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从理论层面看，印尼中文教育的经验印证了语言维系理论、动机理论与输入假说在多语情境下的互补关系，也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在地化路径”提供了实践样本。从实践层面看，应加强师资培训、课程本土化与文化内容的整合，推动印尼三语教育走向更加平衡与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三语学校的兴起为中文教育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实践场域。三语教育模式所折射出的“中文+专业”“职业+中文”等路径，揭示了国际中文教育本体论的实践价值，亦为学术研究与教育政策之间的互动搭建了桥梁。由此，印尼三语教育的经验可望在更广泛的国际中文教育理论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可以预见，未来的印尼中文教育将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一步拓展空间，实现从语言教学到文明交流的功能转型。从学理上看，传承与传播构成中文教育的两大维度：传承着眼于华裔内部的代际承袭，保存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传播则指向跨族群的语际交流，传递中华文明的价值与智慧。二者交织互动，共同塑造了印尼中文教育的独特路径，也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动力。

参考文献

- 八华学校、校友会特刊 BULETIN PAHOA, (2010)。
- 陈友明 (2013): 软实力视野下印尼新兴三语国民学校现状及宏观管理问题研究, 《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作用.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 陈友明 (2014): 印尼三语学校华文教学考察探析,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商务印书馆。
- 陈友明 (2018): “一带一路” 框架下印中合作的困难与影响因素, 《“当代印尼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 广州。
- 陈友明 (2022): 疫情之下印尼三语学校中文教育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世界华文教学》(第九辑)。
- 周清海 (2009): 海外华人在多语背景下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态度, 陈晓锦、张双庆编: 《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郭熙 (2024): 中国话在海外播迁散记, 《华语传承》, 原载《博览群书》2024年第3期。
- 郭熙 (2025): 《新时代的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
- 郭秀丽 (2023): 科学看待儿童说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报》。
- 黄昆章 (1991): 四十年来印尼华侨华人文教事业的兴衰,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 梁英明 (2008): 从东南亚华人看文化交流与融合, 《东南亚华人研究—新世纪新视野》。
- 李如龙 (2000): 南洋客家人的语言与文化, 李如龙主编: 《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 (2000): 略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 李如龙主编: 《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 (2024): 关于方言、汉语、汉字的特征思考, 本文转载于: 语言学心得。汉语堂 2024.2.2。
- 廖建裕 (LEO SURYADINATA) (2018): 《未竟之路》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一册), 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有限公司。
- 李学民、黄昆章 (2005): 《印尼华侨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宇明 (2021): 儿童语言研究是为了服务儿童而非为了验证理论, 转自微信公众号: 语标来源: 《语言文字应用》。
- 李宇明 (2022): 《试论全球化与跨文化人才培养问题》, 汉语堂 2022-08-03。
- 刘泽彭、陈奕平等 (2018): 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张云 (2019): 华化、离散与治理: “华人穆斯林” 与 “一带一路” 的前现代关联, 《南洋问题研究》。
- 庄国土 (2001): 《华侨, 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 印尼国家统计局 *Badan Pusat Statistik* <https://www.bps.go.id>。
-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Belt and Road*”. Xinhua. March 29, 2015.
- Gontha, Peter. F. (2017) “*Semua Jalan Menuju Beijing*”, Kompas, 24 Mei 2017.

A Study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Indonesian Multiculturalism

CHEN, Youming

Abstract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been in Indonesia for nearly three hundred years and have always valued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eir childre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languages, local dialects, and English on the spread of Chinese language in Indonesia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ocial structure,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Since modern times, with the gradual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lonial system and the purposeful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state,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in Indonesia have undergone a complex process of alternating suppression and reviva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has gradually adjusted its language policy,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and implemented China-friendly foreign policies, resulting in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social space for the reviva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trilingual education model—teaching Indonesian, Chinese, and English simultaneously—came into being and marked a shift in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intra-ethnic tradition to a modern, diversified educational paradigm. This model not only expands the number of people receiving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making it a share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 across ethnic groups, but also embodies the inclusiv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for all’. By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engaging with local culture, trilingual school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tructural role in promoting cultural dissemination, fostering the co-creation of values, and building social cohes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no-Indonesian cooperation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with rapid growth in Chinese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s in Indonesia. The surge in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professionals has spurred enthusiasm among ethnic Chinese and other groups to learn Chinese, understand China, and experience Chinese culture. Diversified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workplace Chines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emerged as new features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current Indonesia.

Trilingual schools face uniqu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both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s they are posited to play a positive, if not pivotal, role in fostering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 and Indonesia.

Keywords: Indonesian Chinese, multiculturalism, Chinese education, trilingual education, language inheritance